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tree branch with several leaves. The leaves are mostly yellow and brown, suggesting autumn. The branch is dark and runs diagonally across the frame. The overall tone is muted and artistic.

清  
词  
一  
千  
首

篋中詞

清詞一千首

清 · 譚 獻 輯

羅仲鼎  
俞浣萍 校点

# 清词一千首

## 篋中词

清·谭 献 辑

罗仲鼎 俞浣萍 校点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萧山市文联印刷厂印刷

(萧山市环城南路 28 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8 字数:457 千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7-80518-280-9/I·163

---

定价:22.00 元

柯(惠言),周介存(济)之学。」更是明确宣称自己编撰《篋中词》之目的,就是为了推衍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主张。

常州词派是清代后期影响最大的一个词派,其代表人物是张惠言、周济等人。嘉、道以还,常州词派取代了浙派的地位,主盟词坛几达百年之久。清代晚期的著名词论家,如谭献、陈延焯、冯煦等人,无不受其影响。常州派词学理论主张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呢?约而言之,大致有四个方面,即尊词体,重词意,讲寄托,倡复古。所谓尊词体就是承认词这种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平等地位,认为词是正统儒家诗教所肯定的「风骚乐府之遗」,是唐诗的一种发展变化,而不是什么「诗之余」,从而批评那种认为词是「小道」,士大夫「不屑为」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提出这一理论主张的目的在于提高词的地位,扩大词的门径,藉以提高词学创作的思想艺术水平。用张惠言的话来说就是要「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怨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讽诵之也」①。晚清及民国之初,词学创作与研究之风盛极一时,这固然与时代观念的演进密切相连,但与尊词体观念的倡导也有一定关系。重词意实际上是儒家诗教「诗言志」这一观点在词学创作中的移植,这一理论又与词学创作中的移植,这一理论又与尊词体的主张密切相关。既然词并非「小道」,既然词与诗一样也是「风骚乐府之遗」,那么理所当然地「诗言志」的基本原则也同样适用于词了,这就要求词的创作不能一味「跌落靡丽」而成为侧艳之词;而应该有堂堂正正的社会内容,应该像诗歌一样「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②。「讲寄托则是强调词在艺术表现方法上不同于诗,词应该是「意内而言外」,必须「低回要眇以言其致」③,这就要求词人运用比兴寄托的抒情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情志,努力去创造一种「意内言外」的理想美学境界。至于倡复古,主要是为自己追求的理想美学境界树立一个典型,而张惠言认为唐代的词人,尤其是温庭

研词学，在词的创作和词学理论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杰出的成就，正如叶恭绰先生在《广篋中词》中所说：「仲修先生承常州派之绪，力尊词体，上溯风骚，词之门庭，缘是益廓，遂开近三十年之风尚。论清词者，当在不桃之列。」这段话不仅分析了谭献对晚清词学发展的贡献，而且还指出了他在近代词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谭献自己在《复堂词录叙》中回顾道：「献十有五而学诗，二十二旅病会稽，乃始为词，未尝深观之也。然喜寻其旨于人事，论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三十而后，审其流别，乃复得先正绪言，以相启发。年逾四十，益明于古乐府之似在乐府，乐府之余在词。昔云：『礼失而求之野。』其诸乐失而求之词乎？然而靡曼荧眩，变本加厉，日出而不穷，因是以鄙夷焉，挥斥焉。又其为体，固不必与庄语也，而后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者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言思拟议之穷，而喜怒哀乐之相发，向之未有得于诗者，今遂有得于词。是者年至五十，其见始定。」在这段自叙性的文字中，谭献不仅详细叙述了自己从事词学创作的历程，总结了研究词学的心得，而且指明当代词风的弊病，公开说明自己的词学理论主张。「年至五十，其见始定」，足见并非一时兴到之言，而是经过长期摸索，反复实践，深思熟虑而后提出的理论主张。这里最著名的理论观点便是「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很明显，这是常州词派代表人物周济「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理论观点的继承、发展和衍伸。在《复堂日记》中，谭献曾经给予周济的「出入说」以极高的评价说：「以有寄托入，无寄托出，千古词章之能事尽，岂独填词为然。」他认为周济的理论不仅是词学创作的最高境界，而且也是千古文章的最高境界。这样的评价，未必是客观公允之见，但是至少表明了谭氏对常州词派理论主张的认同与赞赏。他在批评王昶《国朝词综》弃取标准失当时说：「予欲撰《篋中词》，以衍张茗

柯(惠言),周介存(济)之学。』更是明确宣称自己编撰《篋中词》之目的,就是为了推衍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主张。

常州词派是清代后期影响最大的一个词派,其代表人物是张惠言、周济等人。嘉、道以还,常州词派取代了浙派的地位,主盟词坛几达百年之久。清代晚期的著名词论家,如谭献、陈延焯、冯煦等人,无不受其影响。常州派词学理论主张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呢?约而言之,大致有四个方面,即尊词体,重词意,讲寄托,倡复古。所谓尊词体就是承认词这种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平等地位,认为词是正统儒家诗教所肯定的「风骚乐府之遗」,是唐诗的一种发展变化,而不是什么「诗之余」,从而批评那种认为词是「小道」,士大夫「不屑为」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提出这一理论主张的目的在于提高词的地位,扩大词的门径,藉以提高词学创作的思想艺术水平。用张惠言的话来说就是要「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怨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讽诵之也」①。晚清及民国之初,词学创作与研究之风盛极一时,这固然与时代观念的演进密切相关,但与尊词体观念的倡导也有一定关系。重词意实际上是儒家诗教「诗言志」这一观点在词学创作中的移植,这一理论又与词学创作中的移植,这一理论又与尊词体的主张密切相关。既然词并非「小道」,既然词与诗一样也是「风骚乐府之遗」,那么理所当然地「诗言志」的基本原则也同样适用于词了,这就要求词的创作不能一味「跌荡靡丽」而成为侧艳之词,而应该有堂堂正正的社会内容,应该像诗歌一样「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②。「讲寄托则是强调词在艺术表现方法上不同于诗,词应该是「意内而言外」,必须「低回要眇以言其致」③,这就要求词人运用比兴寄托的抒情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情志,努力去创造一种「意内言外」的理想美学境界。至于倡复古,主要是为自己追求的理想美学境界树立一个典型,而张惠言认为唐代的词人,尤其是温庭



筠的词，「其言深美闳约」，篇篇有寄托，是词人的最高典范。五代以后的词作，都不免于「杂流」，以至于「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常州词派这一理论观点的保守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评论具体作家时也不免常常流于牵强附会，与事实不符。不过，这一点并非张惠言立言的宗旨所在，我们不能仅仅从表面上看问题。要了解张氏立言的根本宗旨，还是离不开当时总的历史文化背景。

乾、嘉以前，清代词坛大体为浙派所笼罩。从清初浙派宗师朱彝尊之开宗立派，领袖群彦，标榜以南宋词人姜夔、张炎为模习的典范，到雍、乾之世以词风之「幽深窈曲」闻名于世的词坛巨匠厉鹗，再到嘉、道之际有「浙派殿军」之称的郭，这一流派绵延流传了百年之久而不衰。但是，由于社会的原因和浙派词人理论主张本身的局限，在这一流派的发展嬗变过程中，其弱点和弊病也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词的内容逐渐趋向空虚狭窄，词的风格则每流为轻浅浮滑，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普遍的不满。谢章铤批评说：「大抵今之揣摩南宋，只求清雅而已，故专以委夷妥帖为上，而不知南宋之所以胜人者，清矣而尤贵乎真，真则有至情，雅矣而尤贵乎醇，醇则耐寻味。若徒字句修洁，声韵圆转，而置立意于不讲，则亦姜、史之皮毛，周、张之枝叶已。虽不纤靡，亦且浮腻，虽不叫嚣，亦且薄弱④。」谢章铤指出了浙派末流缺少真情醇味，不重视立意，而只注意「字句修洁，声韵圆转」，这种舍本逐末的结果使词风变得「浮腻薄弱」，如此学习南宋，无疑只能得其皮毛枝叶，而难以得其精神实质。谢章铤的批评指出了浙派后期词风的通病，是很有见地的。不过，谢章铤的批评主要还是从艺术方面提出的针砭。如果结合当时的社会形势来看，浙派这种弊病就显得尤其突出了。清王朝在经历了康、雍、乾的全盛时期以后，到了嘉、道年间，封建社会母体所具有的一切弊端都开始充分显露出来，官吏腐败，贿赂公行，灾害频仍，民不聊生，这座封建大厦离开完全倒塌虽然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根基已经朽坏，一遇风雨就摇摇欲坠。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山雨欲来风满楼」，动荡的社会呼唤文艺的变革。「常州词派」正是适应这种社会形势而产生的一个文艺流派，它们打着反对「雕琢曼词」的旗号，主张词首先必须重意，应该抒写「贤人君子幽约怨排之情」<sup>⑤</sup>，必须继承风骚乐府的优良传统，讲究比兴寄托。虽然这种主张仅仅是封建社会内部部分知识分子试图补弊救偏，进行改良的主张，与当时那种天崩地坼、腥风血雨的社会形势并不完全相称，而且这种理论主张本身还具有相当的保守消极因素。不过，对于荡涤当时弥漫于词坛的不良风气，毕竟还是起了一定进步作用的。常州词派继浙派以后之所以能够统治词坛达百年之久，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 二

古人编造诗文选本，往往是为了推衍一种理论主张，并为自己的理论主张树立典范。明清以后，此风尤炽。远者如明代复古派李攀龙的《选唐诗》、竟陵派钟惺的《古诗归》、清初神韵派王士禛的《唐贤三昧集》、近者如浙西词派朱彝尊的《词综》、常州词派张惠言的《宛邻词选》以及周济的《宋四家词选》等等都是如此。谭献的《篋中词》也不例外。前面已经提到，谭氏编撰《篋中词》是为了推衍张、周常州词派的理论主张，批评纠正浙派末流日趋空虚浮滑的词风，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对另一部当时影响颇大，代表浙派词学观点的清词选本《国朝词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阅王氏《词综》四十八卷，二集八卷。王侍郎去取之旨，本之朱锡鬯，而鲜妍修饰，徒拾南渡之浑，以石帚、玉田为极轨，不独珠玉、六一、淮



海、清真皆成绝响，即中仙、梦窗深处，全未窥见。」（《复堂日记》）在《篋中词》中他又指出：「浙派为后人诟病，由其以姜、张为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涩，玉田之润。」又说：「南宋词敝，琐屑冗钉，朱、厉二家，学之者流为寒乞。……予初事倚声，颇以频伽名雋，乐于讽咏，继而微窥柔厚之旨，乃觉频伽之薄。又以词尚深涩，而频伽滑矣，后来辨之。」在这些言论中，谭氏推衍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观点，对浙派一味模习南宋姜夔、张炎而又仅得其形，对浙派后期代表人物郭麐等人的词风弊端都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虽然不能算是探本求源的深刻见解，但大体说来尚属持平之论。还应该指出，谭献虽然极力推崇常州词派的理论主张，但是，对常州词派的某些具体见解，他又不完全赞同。他警告道：「常州词派，不善学之，入于平钝廓落，当求其用意深隽处⑥。」他不赞成张惠言《词选》所倡导的一味复古的主张，也不赞同张氏过份推崇唐代词人而以温庭筠为「最高」的观点，说：「四衣大令（潘德舆）与叶生书，略曰：『张氏《词选》抗志希古，标高揭己，宏音雅调，多被排摈。五代、北宋有自昔传诵，非徒只句之警者，张氏亦多忽然置之。窃谓词滥觞于唐，畅于五代，而意格之阔深曲挚，则莫盛于北宋。词之有北宋，犹诗之有盛唐，至南宋则少衰矣』云云。张氏之后，首发难端，亦可谓言之有故。然不求立言宗旨，而以迹论，则亦何异明中叶诗人之侈口盛唐耶？……然其针砭张氏，亦是诤友⑦。」很明显，这里谭氏虽然引用了潘德舆给叶生信中的话，实际上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指出对张惠言《词选》的批评，主要应该看清楚张氏立言的宗旨所在，而不能光看表面现象，否则宗唐也好，宗北宋也好，都可能重蹈明代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的覆辙。其次，在这样的前提下，谭献认为张氏一味推崇唐词，而轻视五代、北宋以后的词家词作是片面的。从词学发展的历史看，把北宋之词比作盛唐之诗可能比较符合实际。再其次，谭氏也同意这样的意见：张氏《词选》弃取标准太严太苛，以致五代、北宋以来许多古今传诵的名篇均

遭排斥。因此他认为潘德輿的言论「亦可谓言之有故」，「针砭张氏，亦是诤友」。对潘德輿意见的肯定，当然也就包含了谭氏对张惠言理论观点的批评与修正。

清代被文学史家称为词学复兴的时代。清词的总体成就虽然比不上两宋，但是，在有清二百七十多年中，词人数量之众多，词作数量之丰富，词派面目之纷繁，都大大超过了前代。仅叶恭绰《全清词抄》一书，初选时已获词家四千余人。近年南京大学编纂《全清词》，据说搜罗到的词家已接近一万人，数量真是惊人。当然，数量并不等于质量，但数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质量。清词这么大的数量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词这种文学形式在清代文人的创作中已经达到相当普及的程度。二是词的创作经历了元、明两代的衰落之后，在清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又一次恢复了生机，焕发了青春。在一段时间之内，有这么多人从事词的创作，产生了这么多的词人词派和词作，必然会对词这种艺术作出许多超越前人的新贡献。就清词发展的各个时期而言，情况的确如此。无论是以抒写黍离麦秀、陵谷沧桑之感见长的云间派，还是以沈雄俊爽、豪迈奔放之风称异的阳羨派，无论是以抒写个人情怀、风格幽隽清绮见长的浙西派，也无论是讲究比兴寄托，追求淳厚之美的常州词派，还是被谭献称为在清代词坛「鼎盛而三」的词人纳兰性德、项鸿祚和蒋春霖，他们都对词这种艺术形式作出过某些独特贡献。陈廷焯说：「词创于六朝，成于三唐，广于五代，盛于两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复盛于我国朝也。国朝之诗可称中兴，词则轶三唐两宋等而上之。……故论词以两宋为宗，而断推国朝为极盛也⑧。」这段话中，「轶三唐两宋等而上之」一语不够周密，有一定的片面性。不过，《云韶集》是陈廷焯早年（一八七四）的作品，他在后来所作的《白雨斋词话》（一八九二）中，对此作了如下修正：「国初诸老，同时杰出，几欲上掩两宋。然才力有余，沉厚不足。盖一代各有专长，宋词已成绝技，后世不能相加也⑨。」这才是比较客

观公允的评论。

清词创作的繁荣，促成了晚清词论研究之风的勃兴，意在推衍自己理论主张或普及词学的各种词论专著和词的选本也纷纷出现。例如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以及稍晚的况周颐《蕙风词话》、王国维《人间词话》，都是负有盛名并对后世产生过很大影响的词学理论专著。在众多的清词选本中，则以代表浙派观点的《国朝词综》、《国朝词综二集》、《国朝词综续编》（王昶编、黄燮清续）以及基本代表常派观点的《篋中词》今续集影响最大。

### 三

谭献不仅精研词学理论，而且在词的创作方面也有极高的成就。陈廷焯指出：「仁和谭献，字仲修，著有《复堂词》，品骨甚高，源委悉达。窥其胸中眼中，下笔时匪独不屑为陈、朱，尽有不甘为梦窗、玉田处。所传虽不多，自是高境<sup>⑩</sup>。」徐珂也说：「同光间有词学大家，为海内所宗仰者，谭复堂大令是也<sup>⑪</sup>。」这些话指出了谭氏在当日词坛的崇高地位。谭献以词学理论家和著名词人的双重身份遴选清词，编成一集，遂使《篋中词》成为晚清词坛流传很广，影响甚大的一个权威选本。正如冒广生所说：「仁和谭仲修，循吏文人，倚声巨擘。《篋中》一选，海内视为金科玉律<sup>⑫</sup>。」

谭献在《篋中词序》中说过：「至于填词，仆少学焉，得本辄寻其所师，好其所未言，二十余年而后写定，就所睹记题曰『篋中』」。这段自叙足以说明，《篋中词》是谭氏为了宣扬贯彻自己的词学理论主

张，经历了二十多年艰苦劳动才完成的一个清词选本。近人吴梅在《词学通论》中曾经评论说：「《篋中词》二集，搜罗富有，议论正大。」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谭献《篋中词》的两个突出优点。谭氏虽然说过，自己编选《篋中词》是为了「衍张茗柯、周介存之学」，但在实际选录清词作品时，却并不限于一宗一派之偏见，标准较正，取径较宽，既不像明代李攀龙《选唐诗》那样偏仄，也不像张惠言《宛邻词选》那么苛严。凡是清代词坛的名家名作，以至某些地位不高的无名词人以及女词人的优秀作品，他都尽可能搜罗入选。全书一共收录从顺、康到当代的三百七十多位词人的作品近一千篇，清词中那些内容充实、感情真挚、艺术完美，风格独特的作品，大体都被包罗在内。谭氏的词学理论是接近常州词派的，对浙派的理论主张则多所砭斥。不过在具体选词时，却能采取比较客观公允的态度，选录朱彝尊和厉鹗词各十八首，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常州词派的重要作家张惠言（十首）和周济（十首）。朱、厉二人当时传诵的名篇佳句，大体包括无遗。对浙派后期词人如郭麐、戈载等人的词作也能酌情入选，并未一概加以排斥。这样的取舍标准，与清代词坛的实际状况比较吻合。

谭氏对入选词家和作品的掌握采取点面结合的办法，而不是平均分配。除了对浙、常两派重要词人给予较多篇幅之外，特别对被称为清词三大家的纳兰性德（二十五首）、项鸿祚（二十一首）和蒋春霖（二十五首）给予最多的篇幅，并且重点地加以评论。而对一般词人，则往往只录其代表作数首，让读者通过一斑以窥见全豹。这样的安排使得《篋中词》这一只有中等容量的清词选本能够为读者清楚地展示清代词坛的总体面貌和发展流变，成为后人阅读清词和研究清词的重要资料。

谭献《篋中词》的第二个突出优点是议论深刻，品评恰当。编选者以自己长期的研究心得和创作实践为基础，对书中入选的词人词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评论。这种评论不仅对提高读者的鉴赏水平极有

启发，而且往往成为后人研究清词的重要依据。例如，他评论清初词坛状况时说：「锡鬯，其年行而本朝流派始成。顾朱伤于碎，陈厌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渐变。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到。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sup>⑬</sup>。」对清初词坛流派的形式以及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流弊作了精当的说明，对清初两大词派——浙西词派和阳羨派的代表人物朱彝尊和陈维崧词风的优长和缺失作了异常简明扼要的概括，这对人们认识清词的发展变化，阅读和理解具体作品，都很有帮助。

在《篋中词》中，谭氏还通过重点作家的评论，对清代词坛的状况，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评价。例如通过对蒋春霖《水云楼词》的评论，他曾说过一段精彩的话：「文字无大小，必有正变，必有家数。《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三分鼎足。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而晚唐两宋一唱三叹之意，则已微矣。或曰：何以与成、项并论。应之曰：阮亭、葆琳一流，为才人之词，宛邻、止庵一派，为学人之词，唯三家是词人之词，与朱、厉同工异曲。其他则旁流羽翼而已<sup>⑭</sup>。」在这里，谭氏不拘于流派之成见，把词人分为才人之词、学人之词和词人之词三类并以纳兰性德、项鸿祚、蒋春霖为清代鼎足而立的三大词人（加上朱彝尊、厉鹗共为五大词人）。其中除了对项鸿祚的评价稍有偏颇之外，大体上都是公允持平之见。《篋中词》对具体词人词作的评论，也有许多深刻细致，足以发人深省的见解。如对厉鹗的词评论说：「太鸿思力，可到清真，苦为玉田所累。填词至太鸿，真可分中仙、梦窗之席，世人争赏其短钉羸弱之作，所谓微之识砭砭也<sup>⑮</sup>。」这段话对浙派中坚人物厉鹗词的优长及流弊作了细致全面的分析，客观公允，切中肯綮。又如对项鸿祚《忆云词》的评论：「莲生古之伤心人也。回肠荡气，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涩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无其率，有梦窗之深细而化其滞，殆欲前无古人。……以或容若之贵，项莲生之富，而填词皆幽艳哀断，异曲同工，所

谓别有怀抱者也。」①⑥尽管后人对谭氏这段评论颇多异议，认为是过誉之词。但项鸿祚毕竟是清代词坛具有独特抒情风格的名家，而谭氏对其词风细致入微的描述与比较，的确是独到之见，对读者认识和把握项词的风格特色，还是很有启发的。

作为反映一代词坛面貌的权威选本，《篋中词》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由于编选者是以一人之力来完成这一工程的，加上当时图书资料条件的限制，致使个别重要的作家作品未能入选。《篋中词》完成于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刊印于光绪八年，离清朝灭亡还有三十多年，因此，有些清末名家的作品自然无法入选。又，续集四卷由于是按补人补词之例陆续完成的，编排考订尚欠周密，除了部分作者名字重复出现之外，还有个别作品重复入选。再有，谭献受常州派理论的影响较深，有时不免在作品之中寻求难以确指的言外之意，因而不免牵强附会之弊。

#### 四

此书以光绪八年刊《篋中词》今、续集为底本，同时参照叶恭绰《全清词抄》、王昶《国朝词综》、《国朝词综二集》、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陈廷焯《词则》等选本以及有关词人的专集，互相参校，改正了某些明显的错误。对重要异文，则同时列出，供读者参考。《篋中词》今集之后原附谭氏自己的《复堂词》，单独作为第六卷。为了与其他清词作家保持适当的比例，我们把这一卷全部删去，据叶恭绰《全清词抄》另录谭氏词作十七首作为附录。这样，原书共录清代三百七十五位词人的作品共九百八十四首，

删去重出的一首，加上附录《复堂词》十七首，正好凑足一千之数，故名之为《清词一千首》。原书除对个别作者有简单注释之外，没有作家小传，现据有关资料为补足之，以利阅读。

在此书的整理校点过程中，友人屈兴国、黄建国曾热情提供资料，故旧情谊，书以志感。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六日 罗仲鼎

注释：

①②③张惠言《词选序》。

④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

⑤张惠言《词选序》。

⑥⑦见《篋中词》。

⑧陈廷焯《云韶集》，转引自屈兴国《白雨斋词话校注》。

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

⑩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

⑪徐珂《近词丛话》。

⑫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卷一。

⑬⑭⑮⑯见《篋中词》。



## 冯煦原序

仲修有《篋中词》今集之选，始自国初，迄于并世作者，而以所为《复堂词》一卷附焉，刻于江宁，属为校字。是选与青浦王氏、海盐黄氏，颇有异同，旨隐辞微，且出二家外。其题词名者从别集，仅题名者从诸家选本，第就篋中所存，甄采百一，布之四方，以为嚆引。续有所得，则仿补人、补词之例。又宋曾慥《乐府雅词》，赵闻礼《阳春白雪》，周密《绝妙好词》，皆以己作与诸家并列，仲修犹前志也。刻既竟，爰述其缘起如此。壬午秋七月，金坛冯煦。

